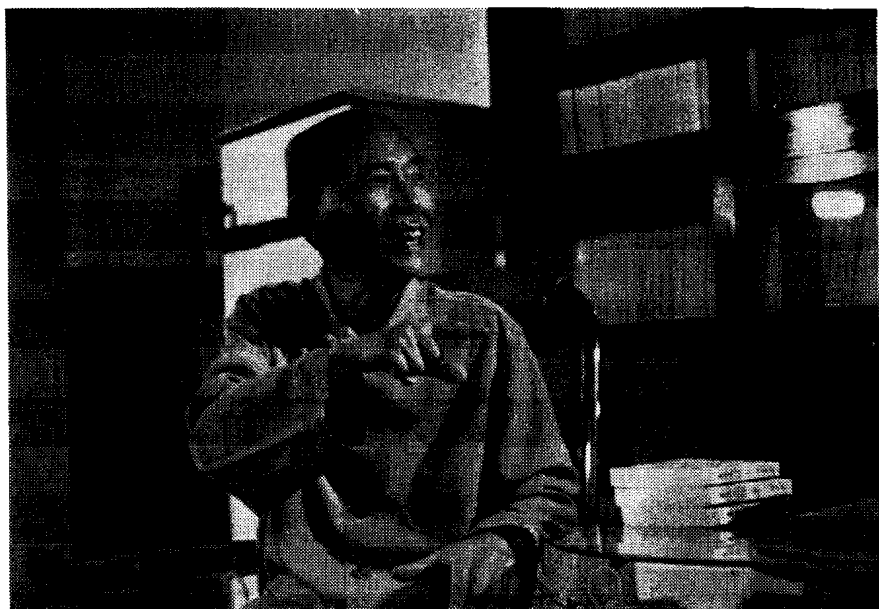




作者像

回顧筆記

右「回顧」以下短文若干篇，大部為最近兩年來所作。『管輪理』及『金蓮會』印象則為三十七以前之舊作，大概發表在當時的『文學』，我早已把它們忘記了。有不相識的年青朋友勇以見贈，但在香港戰爭中也付之一炬。後來在桂林拾遺集而藏舊刊物中抄出，和別的舊作雜文合印為一冊，題名曰『白楊札證』，這一冊現在也絕版了。

『管輪理』三篇及『歸途雜錄』都是印度記一種的東西。如此等所收其他之稿性質雖不一律，這也有它的原由。當初在友公司趙富厚君提印我的雜文，謂須有八万字乃可。于是我搜集兩年來所寫『管輪理』等三篇，共七輯，都為一卷，題雜文序記之稿，名為一時期的心事，不表定事。當時我還怕有三八万字呢。那知富厚兄所謂八万字，概連空白在內，而我則連連從前

序

此所谓论创作,实际上是杂凑的东西。其中第一部分,算是自己谈创作经验,其实大多是写在一些短篇集(三十年代由几家私营书店出版)的前言、后记,有些早已成为陈年冷饭,另一些是在解放后出版的《茅盾文集》内抄下来的。第二部分,是评论人家的作品的,包括一些作家论,连我自己也记不起当时写过这些作家论。这些作家论,解放后出版的《茅盾文集》都未收入,原因是当时我不要在文集中收入从前写过的评论文。第三部分,是泛论创作的选材、构思等等的,大部分也谈到技巧。这一部分有几篇曾收入《茅盾文集》和《鼓吹集》。

编这本书的叶子铭同志认为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再印,既可以看到我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也对于现在从事于创作的青年有点参考价值。

我则觉得在我行将就木之年,炒这些冷饭,也有总结我过去工作的意味。书既排印,例应写几句,是为序。

茅 盾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

目 次

序

第 一 辑

几句旧话·····	3
我的回顾·····	7
答国际文学社问·····	12
回顾·····	14
《茅盾选集》自序·····	19
谈我的研究·····	23
从牯岭到东京·····	28
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	44
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48
《宿莽》弁言·····	53
《路》改版后记·····	54
《子夜》后记·····	56
《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58
再来补充几句·····	62
我怎样写《春蚕》·····	65
《速写与随笔》前记·····	70
《第一阶段的故事》新版的后记·····	74

《见闻杂记》后记·····	80
《腐蚀》后记·····	83
《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	87
《清明前后》后记·····	91
春明版《茅盾文集》后记·····	94
《茅盾文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集后记·····	96
《茅盾文集》第八卷短篇小说集后记·····	99

第 二 辑

读《呐喊》·····	105
鲁迅论·····	110
论鲁迅的小说·····	139
王鲁彦论·····	147
徐志摩论·····	156
庐隐论·····	176
冰心论·····	184
落华生论·····	205
女作家丁玲·····	215
丁玲的《母亲》·····	220
读《倪焕之》·····	225
《地泉》读后感·····	244
《法律外的航线》读后感·····	249
“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	254
王统照的《山雨》·····	266
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	278
《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	287

《西柳集》·····	297
《北方的原野》·····	308
读《乡下姑娘》·····	314
关于《遥远的爱》·····	323
《呼兰河传》序·····	328
谈最近的短篇小说·····	337
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	352
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的通信·····	398

第 三 辑

致文学青年·····	421
一个文学青年的梦·····	428
思想与经验·····	432
“蚂蚁爬石像”·····	435
论模仿·····	439
谈题材的“选择”·····	441
关于“出题目”·····	447
创作的准备·····	450
一 学习与摹仿·····	450
二 基本练习·····	454
三 收集材料·····	460
四 关于“人物”·····	465
五 从“人物”到“环境”·····	470
六 写大纲·····	474
七 自己检查自己·····	480
八 几个疑问·····	488

杂谈文学修养·····	493
大题小解·····	500
谈描写的技巧·····	506
——大题小解之二	
从思想到技巧·····	509
杂谈思想与技巧、学力与经验·····	515
有意为之·····	520
——谈如何收集题材	
谈“人物描写”·····	525
对于文坛的一种风气的看法·····	532
——谈长篇小说需要之多及其写作	
对于文坛的又一风气的看法·····	539
——谈短篇小说之不短及其他	
个性问题与天才问题·····	543
——答复“想搞文学”的青年的第一个问题	
如何辨别作品的好坏·····	551
——答复“想搞文学”的青年的第二个问题	
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	558
怎样阅读文艺作品·····	563
关于艺术的技巧·····	572
——在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的讲演	
短篇创作三题·····	583
——与青年作者的一次谈话	
漫谈文艺创作·····	590
编后记·····	叶子铭 608

第一辑

几 句 旧 话

一九二六，也许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年。因为从这年的元旦起，我的生活起了小小的波澜。那一天，我是开往广州去的醒狮轮船的搭客，同伴有五个。

离开学校后，我在某书馆充当编辑。我这职业，使我和文学发生了关系。但是一九二六年元旦我上了醒狮轮船以后，我和文学的“职业的关系”就此割断；在轮船上，我写了一篇《南行日记》，到汕头时寄给上海的朋友，我还预备再写，还预计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可以多写，不料既到广州，我就住下了，不但《南行日记》无从继续，简直的和文学暂时绝缘。

那时的广州是一大洪炉，一大旋涡。——一大矛盾！

到三月二十日，这洪炉，这旋涡，来了一个“爆发”。

四月中，我回到了上海；没有职业，可是很忙。那时我的身体比现在好多了，往往奔波竟日以后，还不觉得疲倦，还想做一点自己兴味所在的事。于是我就研究中国神话。这和我白天之所忙，好象有“天渊之隔”，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调换心力的一法。

同时我又打算忙里偷闲来试写小说了。这是因为有几个女性的思想意识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女学生或女性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

枉读了几句书。并且她们对于革命又抱着异常浓烈的幻想。是这幻想使她走进了革命，虽则不过在边缘上张望。也有在生活的另一方面碰了钉子，于是愤愤然要革命了，她对于革命就在幻想之外再加了一点怀疑的心情。和她们并肩站着的，又有完全不同的典型。她们给我一个强烈的对照，我那试写小说的企图也就一天一天加强。晚上依然弄古董的神话，可是只想快些结束；白天呢，不论在路上走，在电车里，或是在等候人来的时候，我的思想常常为了意念中那小说的结构而烦忙。

记得八月里的一天晚上，我开过了会，打算回家；那时外面大雨，没有行人，没有车子，雨点打在雨伞上腾腾地响，和我同路的，就是我注意中的女性之一。刚才开会的时候，她说话太多了，此时她脸上还带着兴奋的红光。我们一路走，我忽然感到“文思汹涌”，要是可能，我想我那时在大雨下也会捉笔写起来罢？

这晚回家后我就计划了那小说的第一次大纲。

就那样既和文学断绝了“职业”的关系以后，我又“非职业”的再度和文学发生了来往。

那时计划下了的小说大纲，就是后来那《幻灭》的前半部材料。从计划大纲到动手写，隔开了整整一年。这一年中间，我在革命的洪流里滚。那“大纲”写了后就没有工夫再修改，一九二七年正月我到武汉后就连这“大纲”也忘记得干干净净，就连我曾经有那样的“创作冲动”也忘记得干干净净。

这时的武汉又是一大漩涡，一大矛盾！

而我在上海所见的那样思想意识的女性也在武汉发现了。并且因为是在紧张的大漩涡中，她们的性格便更加显露。那时我的工作使我每天一定要接触许多人，而且一定要有许多时间化

在路上，——轮渡或洋车，而且有时也要等候人，那时候，我偶然也有“写点小说罢”那样的念头闪过，但是只不过一闪而已，从没继续到十多分钟。因为不但忙，我的身体也不象半年前那么健康。非到午夜二时不能睡觉，第二天十点多起身后又得会客，又要跑机关，又要开会，什么不急之务的“写小说”自然断了念头。

终于那“大矛盾”又“爆发”了！我眼见许多人出乖露丑，我眼见许多“时代女性”发狂颓废，悲观消沉。我离开武汉，到牯岭去养病。

襄阳丸的三等舱里有一个铺位上象帐幔似的挂着两条淡青色的女裙。这用意也许是遮隔人们的视线，然而却引起了人们的注视。我于是在这“人海”的三等舱里又发见了在上海也在武汉见过的两位女性。她们也是要到九江。从她们嘴里，我知道了这下水船上有我的许多熟人。于是那一年前写下而且搁在上海寓所里的所谓小说大纲突又浮上了我的意识。这次因为是闲身子了，就让这“大纲”在我意识上闪动，闪动。

九江住了半天，就上牯岭。找定了旅舍后第一件事就是再弹“老调”，好象题目就是《牯岭通信》。

虽然是养病，幸而我的病不过是神经衰弱和失眠，我总得弄点事来度日子。尤其是到了山上不满四天，从汉口一同来的两个朋友都走了，我独个儿便想游山也提不起兴致。

那么正可以试试写小说了，可不是么？然而据说写了字的纸片常常会闯祸，特别在那时候客中。我简单的行李中却还带着一本书：英译的西班牙小说家柴玛萨斯的作品。光景这是不会闯祸的，我就翻译其中的一篇：《他们的儿子》。这无非因为在山上没事做，而又不肯离开这样空气好的地方。

刚到山上的时候，熟人很多；一个庐山大旅社几乎全是武汉下来的逋客。七月杪，他们都分批走了。后来又来了三位，只住一天，就到白云深处的什么洞去避署。热闹过一时的牯岭，暂时又冷静了。人在那里只看见云雾，外面的世界闹得怎样，可不大明白。那时还有两位相识者留在山上。都是女子，一位住在医院里，我去访过她一次，只谈了不多几句，她就低声说：“这里不便说话”。又一位住在“管理局”，权充了那边的林太太的“清客”；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山上世界一个大概。

秋风起后，我就回上海。从乱纸堆里翻出一年前所记的“大纲”来看，我觉得这大纲不能不大加改削了。

那时候，我坐定下来写；结果便是《幻灭》和《动摇》。

所以《幻灭》中把三个女性做了主角，不是偶然的。稍稍知道我的生平，但和我并不相识的人们，便要猜想那三位女性到底是谁，甚至想做“索隐”。然而假使他们和我熟识并且也认识我的男女朋友，恐怕他们就会明白那三个女主角绝对不是三个人，而是许多人，——就是三种典型。

并且这三种典型，我写来也有轻重之分。我注意写的，是静女士这一典型；其他两位，只是陪衬，只是对照。而况我又没有写一个真正革命的女性。所以我是应该挨骂的。

五一节，一九三三年，上海

（选自《创作的经验》，天马书店一九三三年六月版）

我的回顾

一九二七年九月，我开始做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算是例外。那时并没生病，却也不做小说；那时，我写了些学术的（说来自己觉得惭愧）小本子，例如《中国神话研究》之类；那时候，有几位朋友劝我专心做小说，不要弄那些“杂著”，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很感激，可是天性喜欢东拉西扯的我并不能严守朋友们的规劝，后来我又写过一些神话方面的杂著，甚至于大胆地论述西洋文学的源流变迁等等。

现在来算这五年工夫的总账，回头看看，我不免“汗流浹背”了。虽则朋友们对于我的期望是写小说，而我在五年来亦已胡乱写成了一百万字的小说，可是这些作品当真有点意思么？

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意义。这是我五年来一贯的态度。至于我的观察究竟深刻到怎样，我的技术究竟有没有独创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敢自信！虽则我常常以“深刻”和“独创”自家勉励，我一面在做，一面在学，可是我很知道进步不多，我离开那真正的深刻和独创还是很

远呀！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太大胆了！

然而我还是继续在写。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老，我的脑神经还没有硬化，我还能够学习。每逢翻读自家的旧作，自己看出了毛病来的时候，我一方面万分惭愧，而同时另一方面却长出勇气来，因为居今日而知昨日之非，便是我的自我批评的工夫有了进展；我于是仔细地咀嚼我这失败的经验，我生气虎虎地再来动手做一篇新的。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现在总算写了一百万字了，其中有七十万字是长篇小说。我的创作才能毕竟如何，人家大概早已看了出来；但在我自己，却觉得我的创作活动还只不过开了一个头。人家问我：哪几篇是我自家得意的作品？我不能回答。虽则无论长篇短篇，我从构思到成篇，从来不敢草率，但是过后再看，没有一篇是自家得意的。所以我不能回答。但假使把我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全部当作我努力上进的“里程碑”来看时，那我倒有几句话可说。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长篇小说《幻灭》，接着又写了《动摇》和《追求》，也是长篇。第四次的作品《创造》方是短篇。这算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尝试。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

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虽然知道短篇小说的作法和长篇不同，短篇小说应该是横截面的写法，因而同一的题材可以写成长篇，也可以写成短篇；但是那时候的我笨手笨脚，总嫌几千字的短篇里容纳不下复杂的题材。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脱稿时，我觉得比做长篇还要吃力，我不会写短篇小说！

以后我又写了《自杀》等四五个短篇。在题材上和技术上，都和那《创造》同属一类，实在可说是浪费笔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后，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的长篇小说《虹》也无力续完，（这是想把“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的时期作为背景的，但刚刚写到“五卅”运动爆发就因为生病而停顿了）于是我又再试试短篇。这结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呢，却觉得《陀螺》和从前写的短篇有点不同，至少，从前那种“无从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摆脱了一些了。

但在题材方面，这《陀螺》还是和《创造》等篇没有什么两样。那时我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我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我没有新题材。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时候总没想到应用自家亲身经历过的“旧题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在《幻灭》，《动摇》，以及那未完的《虹》里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现，我应该苦心地再处理那些题材。然而写著《陀螺》那时候的我却从没这样打算过。似乎因为自家不满意那几部旧作，就连带地撇开了那些旧题材。另外我还有一种不成理的意见：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这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而我那时的精神不许我写长篇。最后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对于那些“旧题材”的从新估定价值还没有把握。自家觉得写了出来时大概仍是“老调”，

还不如不写。

但是想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的意志却很坚强。同时我又走回血肉斗争的大都市上海来了，这是一九三〇年春天。而病又跟着来了。这次是更厉害的神经衰弱和胃病。小说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然而这样“无事忙”的我，偶尔清早起来无可消遣，（这时候，人家都在第一个梦境里，我当然不能去看他们）便也动动笔，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等三篇就在那样的养病时期中写成了。这算是我第一回写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万字光景。在题材方面，我算是改换了，我逃避现实。自然我不缺乏新题材，可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儿，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出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我想我这脾气也许并不算坏！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体方才好些。再开始做小说，又是长篇。那一年就写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事，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起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题材是又一次改换，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里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尝过此中味道的。